

门罗在一篇小说里说,女主人公并不是基督徒,但她家的墙上贴着基督教的语录。门罗说“因为这些就是人们平素有的”。就像现在,许多人并不会写春联,但在春节的时候,他们一定会去买春联来贴到门上,这是“平素有的”。

伦敦的一个秋日,下午,我看见这位男士从一家只供应下午茶的小餐厅里出来,走去旁边的一座教堂。这或许是他每天像时钟一样准时的生活细节之一。他走向教堂的步履太从容了,平素就有的。我也跟着去了这座教堂,他拉开门就像打开自家的门,只是更使了点力。我却有一种神圣感,也不知道那褐色的橡木巨门是一拉还是推,我先推了一下,然后拉开了。

书评与书话

沈伯文

又酷似一对孪生兄弟,乍一看模样相似,但静下心来细瞧瞧,书评和书话间还是有一定形式与内容上的差异的。

书评:望文生义,就是对图书的评论性文章。是对一本书独立而严谨的评论。从艺术性、思想性、文学性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度解读。客观、公正是书评写作作者必须秉承的写作姿态和基本要求。有一不说二,有瑕不掩玉,这样写出的图书评论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,才能把一本好书和姝书公之于众,让购书者“依序索书”。

而书话与书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,书话不拘泥于一本书非要说出子丑寅卯,而是就着作者几十年成长轨迹,再就得一本新书,一直追溯到作者的生平、学养、成就,发散式地进行叙事论文,叙情论人,书话和书评比较,显得活泼不刻板,耐读而有趣味。书话的写作要旨是能纵横捭阖,海阔天空,有时可带点絮语式的抒情,抑或包括一点事实,一点掌故,一点观点,给人以知识,给人以艺术享受。加之文笔生动,充满趣味,让读者对书人事或书市有立体的认知,这样的书话文章便能立得起来。

书评往往出自评论家之手,书话则多来自文化学者、作家乃至是大作家笔下,是他们研究和创作过程中的点点浪花,往往精辟而耀眼。因他们有境界,则自成高格,自有名句,朱自清先生曾说,世间没有不读书而善作文者,世间更没有不善读书而善作文者。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话题。那便是善书话者一定是善读书者,善作文者。出自名家的书话文章,当然是充满意趣和睿智,常读便能浸润一个人的书卷气。

四月,雨是春天的多情。撑着伞在南通古老的寺街里穿行,青苔,窄巷,碎石路,斑驳老墙。想起戴望舒那首著名的《雨巷》,淡淡的忧伤,淡淡的惆怅,美好的韵味,也在忧郁与惆怅间。去寻访历史,细雨作伴,再好不过,恰当的温润,恰当的孤清。西南营36号,旧墙白牌:赵丹故居。立牌时间为1998年11月。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。大门推进去,是有温馨天井的木结构平房。墙角,袅娜的藤藤显示着沧桑岁月里生命的顽强生长。屋前,几十盆大大小小的盆栽营造着简陋里的昂贵。一排已经褪色的玻璃窗门诉说着旧时代的温情。据说,西厢房是赵丹曾经的卧室。

赵丹的父亲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军官,买下了南通的这所住宅,爱结交艺术家朋友的他,并没想到,耳濡目染,儿子从小爱演爱唱灵性萌发。

上中学的时候,赵丹就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办了个“小小剧社”。赵丹的父亲又开了家名叫新新的电影院,于是,

我第一次进入一座西方教堂是20年前在比利时的根特。我记得那是一个阴天。之前读过许多西方文学作品,它们将教堂描写得有血有肉,就像一位满脸皱褶的老人。我已经很熟悉教堂,我自己虚构了一个“平素就有的”教堂。我以为教堂会很热闹,有牧师、有许多穷人,自己会像进入一个中世纪的村庄那样受到款待。但真的来到一座大教堂里,它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巨大、森严、冰冷、阴暗、坚固、线条精确的办公室。正面是十字架,后面是管风琴,使徒们的大理石雕像冷漠无情地屹立在黑暗里,挂着一丝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微笑。上帝的办公室,但他没有来上班。一拉还是推,我先推了一下,然后拉开了。

书评与书话是依附在书业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两只甜果,长期以来,与书业相伴相生。而书评和书话

又酷似一对孪生兄弟,乍一看模样相似,但静下心来细瞧瞧,书评和书话间还是有一定形式与内容上的差异的。

书评:望文生义,就是对图书的评论性文章。是对一本书独立而严谨的评论。从艺术性、思想性、文学性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度解读。客观、公正是书评写作作者必须秉承的写作姿态和基本要求。有一不说二,有瑕不掩玉,这样写出的图书评论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,才能把一本好书和姝书公之于众,让购书者“依序索书”。

而书话与书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,书话不拘泥于一本书非要说出子丑寅卯,而是就着作者几十年成长轨迹,再就得一本新书,一直追溯到作者的生平、学养、成就,发散式地进行叙事论文,叙情论人,书话和书评比较,显得活泼不刻板,耐读而有趣味。书话的写作要旨是能纵横捭阖,海阔天空,有时可带点絮语式的抒情,抑或包括一点事实,一点掌故,一点观点,给人以知识,给人以艺术享受。加之文笔生动,充满趣味,让读者对书人事或书市有立体的认知,这样的书话文章便能立得起来。

书评往往出自评论家之手,书话则多来自文化学者、作家乃至是大作家笔下,是他们研究和创作过程中的点点浪花,往往精辟而耀眼。因他们有境界,则自成高格,自有名句,朱自清先生曾说,世间没有不读书而善作文者,世间更没有不善读书而善作文者。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话题。那便是善书话者一定是善读书者,善作文者。出自名家的书话文章,当然是充满意趣和睿智,常读便能浸润一个人的书卷气。



我很奇怪,迷惑地跟着人们参观这个地方,它并没有我期待的那种法力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些建筑物,它们令崇高、庄严这些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个空间,仿佛进入了大象的腹部。

我更喜欢小教堂,在西方,它们像蜂窝一样,数不胜数。我记得在法国奥尔良附近的乡村中有一

水调歌头·醒狮

韩丛艾

两百年沉睡,致万马无声。今儿轻轻,漫步霄九瞰群星。唤我中华风景,改革纵横驰骋,开放助龙腾。七洲赞狮醒,宇宙舞云旌。

扬传统,追大梦,拓新程。教科突进,更有文化立高层。向往火星耕种,也要海沟寻宝,为世界和平。天地任飞跃,人类共长生。

众所周知,辛亥革命期间没有飞机参战的踪影,但这并不表示革命党没有想到启用飞机。辛亥革命爆发前,孙中山曾指示美洲致公堂和同盟会同志,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餉局,以为日后国内各省武装起义时可给予资助。当时同盟会会员冯自由即奉孙中山电召,从加拿大赶到美国参与这项募款工作。就在武昌首义枪声响起后不久,时在芝加哥的革命党人梅培建议,请筹餉局拨款购买飞机,组成一支飞机队回国参战,如一时找不到飞行员,可雇用美国机师。梅培的建议得到了筹餉局及冯自由等人的赞同,并将此事委托梅培办理。

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看戏、演戏——南通与寺街,怎么不是一代艺术大师起步的摇篮与推手。

1992年10月,赵丹逝世12周年,他的子女手捧父亲骨灰回到南通。母校南通市实验中学设立纪念亭——丹亭。亭中铸有赵丹半身像,基座下安放赵丹的骨灰。

但愿这不是他自少年去上海闯荡、成名、受挫也立业之后的“重回故乡”。

果然,上世纪50年代初,赵丹因母亲逝世,回过一次西南营36号。那次,他还到通师附小等处故地重游,聊起他童年趣事。赵丹晚年曾经深情回忆道:“我是喝濠河水长大的,南通是我的第二故乡,是我艺术的摇篮,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

寺街的西南片已经有了些时尚餐饮店,那里是年轻人的世界。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名叫赵丹的这个电影演

个,因为诗人维庸在这里住过而著名。关押诗人维庸的默恩·苏·卢瓦城堡就在附近。维庸曾经被关押在地牢里。进入那地牢真是恐怖的经验,它位于地下十多米。雨果说得对,“与其说是一个囚室,不如说是一口井”。要沿着陡峭的楼梯走进深渊,这就是但丁写过的场景。我以前以为是虚构,其实在法国十五世纪,这种地牢也是“平素有的”。地层深处,灯光昏暗,一排碗口粗的、灰蒙蒙的铸铁栅栏后面有一个土坑,维庸就关在那里,一丝不挂。

“死亡使他吓得脸色发白,不断战栗低下头,拉紧血管,缩起脖子,肌肉变得软弱无力,关节与神经都扩大伸展。女性的肉体啊,你是如此柔软。”(维庸《遗言》)

他们怎么能把一位诗人关在这里?他是作为强盗而不是作为诗人被

不久,梅培就购置了六架单翼飞机。可接着问题来了:当时革命党人普遍缺乏航空知识,没人会开飞机。后来梅培好不容易雇请到美国飞机工程师威尔霍斯,但一交谈,得知威尔霍斯只是飞机修理工程师,并不会驾驶飞机。显然,如没人会驾机,飞机等于白购。无奈之下还是找到在美国研究飞机构造的谭根,请他随机回国,负责建立空军事宜。谭根答应不久后领到万国航空驾照后再回国效力。此时冯自由因受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餉局委托,以

员,曾经是他们父母、祖父母辈的偶像,也是中国最出色的电影演员。

从西南,穿过马路的地下道,来到寺街的西北部。已有近12个世纪的寺街,全长600余米,宽约3米,是南通市古老历史的见证。寺街和与其平行的官地街住宅群组成古街区,其东侧延伸着大巷、小巷、三街墩巷、中学堂街;

西侧延伸着石桥头、育婴堂巷、侯家巷、胡家园等。雨,飘洗着我们脸上的尘土,也使砖石相间的古旧地面显出洁净。倏然的亲切,一种小时候的味道。漫漫步行,不时可以看见门上有块“南通历史建筑”的铜牌标志,比如这个:“民国杜氏住宅:建于1935年,建筑采用‘一堂三进’式布局,院落错落有致,富有变化,入口大门、山墙及外墙为青砖,用料考究,雕饰精美,具有代表性。”

关押的。与中国“仁者人也”的文化不同,这个地牢,可以想象在西方历史上人的位置。就算是罪犯,就算是“原罪”,这样的地牢也太强大了,里面的刑具更夸张,粗大笨重的铸铁锁链,象腿般的绞架,完全是拘押猛兽用的。这个地牢只有入口,没有出口,下面是无边无际的黑夜。

小教堂是黄色的麻石砌成的,教堂中间铺着彩砖过道,两边是长椅。只有三个窗子,两个在祭坛的两边,一个正对着祭坛。这令教堂的光线很暗。教堂执事是一位满头金发、身材臃肿、戴眼镜的女士。那时候已是黄昏,我因她的金发一亮而发现她,她在两排祷告席之间晃了一下,似乎是刚刚现身。她和我们说话的神情就像一位家庭教师,我以为她就要邀请我去品尝她做的奶酪。但是她说,你们必须离开,我要下班了。

辛亥革命与空军

陆其国

随两架飞机零部件回到上海。不久,南京临时政府成立,两架飞机零部件也运抵南京,并由总统府拨地修筑机场。二十天后,第一架飞机安装完成。不料不知是运输中有闪失,还是装配时出了问题,总之,这架飞机尚未试飞即

发生严重故障。此时,美国驻南京领事找到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,称自己太太很想观看飞行表演。冯自由得知后说,谭根尚

“骏马欢腾四海春,金蛇喜舞九州富”——剥落旧门,大红对联贴得端端正正。

挂牌与对联,历史与今天。一片安静,也许缅怀是适合安静的。天宁寺,这座全国少见的宋元遗留下来的木结构古建筑位于既是巷尾,又是巷首之处。10年前古街区差一点要改造,南通的文人雅士倡议将它保护下来。寺街原名“天宁寺街”,就是因为街内有天宁寺而得名。

平民祥和安宁,才子出类拔萃。天宁寺,你是古街的护佑。

细雨之中的天宁寺以温柔抚慰远客。

平心静气,神乎其技叹此绣,请看明日本栏。

当一个朋友对着另一个陌生朋友介绍我是一位“作家”的时候,说实在,还挺惭愧的。因为我打从心里头佩服的,不是像我这种曾拥有一份“正职”的“业余作家”。而是那些一生一世以“摇笔杆为事业”的写作者,他们不但有才华,更有热情,不但不以苦为苦,还乐在其中!

我十五岁开始投稿登报,二十岁出版第一本散文集,并开启了《大华晚报》“淡水河”副刊及杂志等期刊持续登载近六十篇小说的纪录;紧接着,在《联合报》副刊写报告文学专栏、《皇冠》杂志写读书专栏兼投小说、散文,虽不能说是无往不利,但从此迈向写作的康庄大道。当时源源不绝的写作能量和稿约,确实也助长了我对写作这个行业的信心和胆量。

也不知道哪根筋故障,二十七岁那年,我竟然冲动地想放弃原本热爱的新闻工作,改行做“纯文学”!既想为灵魂深处的呐喊谱曲,也试图为生命的轨道定位——是天真?还是浪漫?是理想?还是欲向自我挑战?当时思虑显然并未成熟。不久,现实亮起了红灯。首先,我发现自己其实不是“打字机”,约什么稿就有能力写什么稿,所谓的灵感,更非“自动墨水瓶”,蘸一蘸就“排版成篇”。我经常独坐书桌前,一球球废稿,准确无误地扔进字纸篓,心情十分焦躁。

稿子寄出无非就是等待刊出,这等待的滋味接近“望梅止渴”。发现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听觉格外敏锐了,只要邮差先生的脚踏车远远“吱”一声刹车,我就像触了电,虔诚祈祷门铃声响,挂号信里就会飞出一张张稿费单。

迫于长期没有足够收入,身为“自由作家”的我,有一天,终于心情黯然地将妈妈送的一条金项链拿到当铺典当。真是人生如戏啊!我竟然听见一声惊呼,抬头一看,这位人坐“高台”的掌柜,居然是中学同班同学美红!

“阿桂!你不是个作家吗?”她两眼圆睁,感到不可思议。“所以才会出现在这里呀!”我还装得挺幽默的哩。其实恨不得夺门而出。

原来,“煮字疗饥”不仅是一句成语。我辛酸地顶着“作家的光环”回家,痛定思痛,觉得如果继续这样“穷困潦倒”地过日子——事实上,金项链赎进赎出好几回合了,也未免太斯文扫地了,唉!我还是回到现实,本本分分地重返职场吧!这一念之间,我“起死回生”了!好在,美丽的作家梦,并不曾因放弃,公余之暇,仍然热衷于舞文弄墨。说也奇怪,没有经济压力之后,灵感就自动归位了,我写得痛快!

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名义,要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,便与威尔霍斯等人先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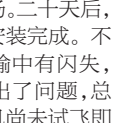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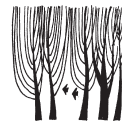
未回国,目前国内没有飞行员,即使飞机安装完成,也没人驾驶,故暂时不宜请外国人参观飞行。1912年2月,第二架飞机安装完成,谭根却仍无回国消息。这时候总统府庶务科长朱卓文毛遂自荐站了出来,说他当年曾随美国机师乘坐飞机几次升空,他也

曾经钻研过开飞机的一些要领,应该可以驾驶。大家将信将疑地答应让他一试。试飞那天,冯自由及总统府许多人都去观看。那天只见朱卓文一脸英气,信心十足地欣然登机。大家紧张地注视着飞机在跑道上由慢到快加速滑行,最后“呼”地一下开始升空——想不到飞机刚一离开地面,还没有完全拉起升空,突然间就像受到重击似的,冷不防坠了下来。好在飞机拉起时离地面很近,朱本人只是头部受到轻伤,并无大碍。民国空军终于没能飞翔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蓝天。而

随着辛亥南北和议告成,中国大地上的武力角逐终于暂时得到平息,一时也不再需要飞机加入战端。有一天,孙中山与唐少川、胡汉民、冯自由等人偶尔谈起飞机的话题,唐少川透露说,当时北京各报曾转载上海电讯,说革命军的飞机能飞到数千尺高空,威力非常了得。也不知袁世凯信以为真,还是有心吓唬隆裕太后,他将此话一转述,着实把隆裕太后吓得不轻,据说这也加紧促成了清室的退位。

你
不
是
作
家
吗
?

桂文亚



十日谈

南通漫步

神乎其技叹此绣,请看明日本栏。